

○专题研究

编者按:对比是语言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本期刊发的 3 篇文章是《索绪尔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比较:方法论与方法》(叶起昌)、《由世界进 从语言出——布龙菲尔德、蒯因、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之争及其中国语言学学派建设的启示》(刘利民)和《语言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卢梭和赫尔德语言起源论之争的实质与意义》(刘兆林)。前两篇文章除了开展语言哲学研究外,还探索该学科对语言哲学的引领功能;后一篇文章则从语言起源研究中引发出语言哲学论题——语言与人的同一性。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多维度 and 广阔的视野。

索绪尔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比较:方法论与方法*

叶起昌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100044)

提 要:本文指出,索绪尔重形式轻意义,海德格尔倡导“思”而弃“计算思维”。语言结构主义后期的弊端之一是僵化的语法术语和繁多的原则。这不仅违背索绪尔的初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严重阻碍了语言学的发展。海德格尔的阐释则带有任意性和独断性,难以模仿与应用。

关键词:方法论;方法;组合;沉思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3)01-0082-8

On th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nd Methods in Saussure and Heidegger's Theories of Language

Ye Qi-chang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Saussure's metho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forms above meaning and Heidegger's way proposes "meditative thinking" by casting off "calculative thinking".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the later stage of linguistic structuralism ceased to develop steadily to a large extent due to numerous rigid terms and rules, and that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is too arbitrary to be imitated and put in use.

Key words: methodology; method; syntagmatic; meditative thinking

1 方法论与方法

方法论(methodology)这个术语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通常指那些可以将一个与另一个科学领域区别开来的特征。它重点考虑与科学的实际操作相关的问题而不是科学哲学中的普遍问题,实际研究在前,方法论在后。方法论还可指对某一学科领域研究的反思。然而,不同方法之间的比较本身就属于方法论范畴。

作为实际研究步骤的方法(method)则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抽象和形式意义上的方法。这类方法不考虑个人或主观判断,因为它们自身就是技巧,一旦技巧熟悉了,就可应用于所有内容。判断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就是应用方法的正确与否,首要考虑的并不是適切与否。指导原则来自方法自身,而不是来自研究的内容,研究的目的在于得到确切的知识。第二类属规范意义上的方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索绪尔与海德格尔语言观对比研究”(08JA740003)的阶段性成果。

法。这类方法非但没有转移或取缔个人或主观判断,相反,主观判断是“好的”判断的得力助手,它肯定了判断与得出的结论不能幸免于主体的猜测。这类方法倾向于“有理”判断,要为作出的判断提供理由。人们通过论证判断确实体现或符合某些普遍接受的标准、规则或准则,从而捍卫自己的判断。所以,这种判断也倾向于“负责任”的判断。上述两种方法的区分可以视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分野。语言研究归于哪一类,目前还没有明确且普遍接受的标准。

2 索绪尔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两种区分

2.1 两种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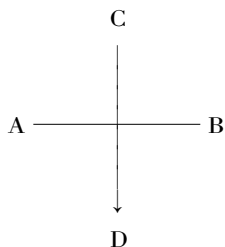
(1) 共时与历时

在索绪尔之前,喀山学派的库尔特内(Baudouin de Courtenay)和克鲁舍夫斯基(M. Kruszevski)早就区分了静态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但能够认识这种区分重要性的首推索绪尔。

索绪尔认为,我们将语言的总体当成系统来理解完全依赖于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所以,这种区分是索绪尔方法论上的首要区别原则。它构成语言学的基础,位于学科中心的就是共时语言学。

索绪尔指出,当我们从价值系统来处理事物时,事物自身的本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二重性,因此语言学必须一分为二(Saussure 1993: 104)。

事实上,只有关注价值的学科才有必要区分出(图₁):(1)同时轴线(AB),它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排除出去;(2)连续轴线(CD),在这条轴线上,人们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但是第一轴线的一切事物及其变化都位于该条轴线上。



图₁ 同时轴线与连续轴线(Saussure 1959: 80)

为什么关注价值要求这种区别呢?原因在于,价值包含系统,且只能在同时轴线上研究,这里不存在系统变化的东西。

索绪尔选择“共时语言学”作为同时轴线上研究语言的名称,历时轴线上的研究则称为“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关注:将共存词项捆绑在一起,并在言说者的集体心智中形成系统的逻辑和心理关系。

辑和心理关系。

而历时语言学关注连续词项捆绑在一起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不为集体心智所感知,这些词项可以相互替代,不形成系统(Saussure 1959: 100)。

这两种语言学研究的主题也各异:共时语言学研究的主题是“语言”,语言是一个拥有心理现实的系统;而历时语言学关注词项间的连续关系,这种关系对说话者而言是无意识的,并且不具系统性。

历时与共时语言学是在方法与原则上对立的两种语言学。它们的最大差别在于视角:共时语言学只关注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在语言社区成员心理上是现实的东西,“要想知道一件事物的实在程度,必须而且只须要探究它在说话者意识中的存在程度”(Saussure 1959: 90)。也就是说,与拥有前瞻与回顾两种视角的历时语言学相比,共时语言学只有一个视角:说话者的视角。其次,差别在于共时语言学研究对象不是同时存在的一切,而只是与每一语言相当的全部事实,必要时可以分到方言和次方言。而历时语言学则没有这种限制,它所考虑的不一定都属于同一种语言。

(2) 语言与言语

索绪尔在方法论上的上述第二个区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语言与言语。语言既指潜在的语言结构又指说话者对这种结构的心智表征,言语就是使用中的语言,即系统与应用之分。

2.2 方法上的两条原则:任意性与线性

索绪尔将符号理解为“概念”与“声音-形象”两方面的组合,随后用“能指”(signifier)来替代“声音-形象”,用“所指”(signified)来替代“概念”(Saussure 1959: 66)。

控制符号的两条基本原则:符号的任意性本质和能指的线性本质。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因此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索绪尔进一步指出其确切含义:任意性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Saussure 1959: 68 - 69)。

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因为它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是任意的。

能指的线性原则是说: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而且具有借自时间的特征:(1)它体现一个长度;(2)这长度只能在一个向度上测定:它是一条线段(Saussure 1959: 70)。

这条原则与任意性原则不同,它仅对能指有效,两条原则在范围上也有所不同。从发声的物

理特征和书写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或是从信息的输入与输出来看,能指的线性原则尽管简单,但却属实。然而,一旦将言语范围扩大到包括说、听、沉默、理解,这条规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理解不可能以直线方式进行。

2.3 价值与差异

系统的第一产物是价值。“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Saussure 1959: 114)。

那么,何谓符号的价值?符号可从下述两方面体现它的价值:(1)交换不同的物;(2)与类似的物相比较(Saussure 1959: 115)。

一个价值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依赖两个要素:不同的物或类似的物。词的价值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可以与观念交换,也可以与另一个词相比。价值就可界定为指定给符号,指定给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集体意义。

在一个系统中的能指之间的最重要关系(创造价值的关系)是差异。正是价值产生了差异系统,这个差异系统就是语言:语言中只有差异(Saussure 1959: 120)。

由于价值是相关、对立和否定的实体,于是在语言里仅有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异。换句话说,差异概念的重要性体现在:语言系统依赖于差异,一个单位在系统里拥有价值是因为它不是同系统里的其他单位。

2.4 横组合与纵聚合

语言系统里的一切都建筑在系统内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之上。这些主要体现为差异的关系可分为两类: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

(1)组合关系:在话语中,语言各项要素以连续的线性顺序编排。

(2)联想关系:在话语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种关系的集合”(Saussure 1959: 123)。

根据索绪尔的看法,在话语中,语词遵守能指的线性本质,语词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在组合关系中,语言要素获得其价值是通过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取得的。

而在话语之外,语词之间的协同关系却是由联想来搭建,发生在言语者的大脑中。

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的明显区别是:一方面,组合关系是在场(in praesentia):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另一方面,

联想关系却把不在场(in absentia)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Saussure 1959: 123)。联想关系只在脑子里,不在语言系统中;而组合关系,则是系统的产物。

从上面的介绍不难看出,索绪尔的语言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区分语词的系统。通过建立组合和聚合关系来标示出语词的相互区别。语词由此拥有自己的身份。

语言在这种模式中不再有神秘色彩,语言被安置在众多物质的世界之中。像所有的其他现实一样,语言是一个系统,“机制”或“组织”。这个系统与意识的产物几乎没有区别,它通过无意识原则起作用。“因为这个系统是一种很复杂的机制,人们要经过反思才能掌握,甚至每天使用语言的人对它也很茫然”(Saussure 1959: 73)。

在不考虑话语和语言变革的前提下,索绪尔清楚地勾勒出他设想的语言学,并将传统的形态学、句法学和词汇学等学科吸纳到理论体系之中(Saussure 1959: 134 - 136)。在这些传统学科中,索绪尔关心的东西始终如一:在语言中揭示词项在组合轴与聚合轴上的系统关联。

很明显,组合和聚合揭示出两种不同的方法。在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确实采取了这些策略。

3 海德格尔探索语言的方法

科学把通向知识之路称为方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海德格尔指出,在现当代科学中,方法并不是一种为科学服务的单纯工具,而是方法绑架并摆弄科学,语言学也不例外(Heidegger 1971a: 74, 1971b: 91)。

语言学研究仅仅只是为了获得关于语言的知识:新近的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研究越来越明显地把目标锁定在对所谓“元语言”的制作上(Heidegger 1971b: 58)。

尽管这类研究有其特殊的正当性和价值,但元语言无非是人们强加在语言之上的东西,这类研究仅仅属于“计算思维”(calculative thinking)。

海德格尔把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思维”,另一类是“沉思”(meditative thinking)(Heidegger 1966: 45 - 47)。

自然科学的方法属前者,它将所有存在的事物当成可计算的单位。这里的“计算”当然不是狭义上的数学运算,而是指下述事实:不论何时,我们计划、组织和研究,总是斤斤计较于所给的条件,总是带着算计好了的意图,它们能达到什么样

的特定目的。于是,我们可以期待确定的结果。这种算计是所有计划性思维的标志。如此思维并不限于数字和使用计算机。计算思维正在算计着 (Calculative thinking computes) (Heidegger 1966: 46)。

据海德格爾的看法,这种现象归因于今人逃离思想。就语言研究而言,这类思维不可能也根本无法涉及语言的本质。它的有效性只限于自身的范围内。

后者的思维是哲学的方法,是阐释学-现象学 (hermeneutical phenomenology),涉及的内容正是指当我们说今人逃离思想时所想的东西。海德格爾当然也意识到,沉思必然引起各种非议,如不切实际、没有根据、无济于事等。但沉思如同计算思维,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因为有可计算的东西就必然存在着不可计算的东西,比如意义就不能通过计算而只能通过理解才能得到。这些不可计算的东西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实践,它要求比其他技艺更精心的呵护。而且它还须等待时机,如同农民播种之后等待种子发芽、成长、成熟。沉思能否解决语言问题? 海德格爾认为,不可能有答案。沉思只是一种努力,尝试在语言中取得一种经验,我们正在通往语言的途中,并不是从语言外进入语言。

3.1 从语言中取得经验必须走现象学之路

海德格爾之所以论述语言,是因为他试图在语言中取得一种经验 (Heidegger 1971b: 57)。

在语言上取得 (Machen) 一种经验意谓着: 接受和顺从语言的要求,从而让我们适当地为语言的要求所关涉,就是住在语言之家中,让语言改变着说语言的我们。

海德格爾表明,他要读者经验语言是经历“思”,这样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的本质 (Heidegger 1966: 14 - 15)。

他强调,存在的揭示不是前规定的 (prescriptive) 不能套用已有的思想范畴迫使存在显示,而只能走现象学之路。

无论什么东西成为本体论的课题,现象学总是通达这种东西的方式,总是通过展示来规定这种东西的方式。

现象学 (phenomenology) 包含“现象” (phenomenon) 和“逻各斯” (logos)。“现象”指的是“表现自身的东西”,而“逻各斯”的最基本含义则是“话语” (discourse),表示一种“揭示”或“展示”。现象学的原理是直面事情本身! 这同样适合阐释学-现象学 (Heidegger 1966: 31ff)。

所谓的“揭示”或“展示”就是“解释”。我们对存在的意义的揭示就是一种重新认识,是一种“解释”。作为一种基本方法,现象学描述的真正意义就已经包含在“解释”活动之中。就其原始词义而言,“此在”的现象学乃是一种解释学。

海德格爾指出,方法(道路)乃是思想(地带)的一部分并归属于思想,这是科学表象无法表达的 (Heidegger 1971b: 74)。因此,有关语言运思经验的道路不在当代科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之中。

那么,研究语言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法? 因为语言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与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在者。

海德格爾正是用“沉思”来表示这种哲学方法。“沉思”之所以是现象学的,是因为它主要是描述性的。尽管通过“沉思”不再是人的层面,而是存在揭示自身与人,在存在的这种自身揭示中,人扮演的角色是描述这种揭示: 将这种揭示相关并复述。这意味着,在描述的意义之上,人必须在场并保留这种揭示。在沉思中,人并不建构与引发存在的揭示: 他有意识地期待着。

为了说明如何在语言中取得经验,海德格爾从寻求诗与思的关系来详尽地阐释斯蒂芬·格奥尔格的《词语》一诗。该诗全文如下:

我把遥远的奇迹或梦想
带到我的疆域边缘

期待着远古的女神降临
在她的渊源深处发现名称……

我于是能把它掌握,严密而结实
穿越整个边界,万物欣荣生辉……

一度幸运的漫游,我达到他的领地
带着一颗宝石,它丰富而细腻

她久久地掂量,然后向我昭示:
“如此,在渊源深处一无所有”

那宝石因此逃离我的双手
我的疆域再没有把宝藏赢获……

我于是哀伤地学会了弃绝:
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Heidegger 1971b: 60)

3.2 诗与思

正是通过解读《词语》一诗,海德格爾清楚地

说明了“思”与“在语言中取得一种经验”的同一。

这首诗并不是指一个诗人碰巧遇到写诗的难处,而是诉说诗人与语言的一种经历。在这种经历中,诗人与语言的关系得到改变。诗歌前3节讲述诗人与语言的先前关系,这种关系类似语言工具论的观点。按该观点来解读,诗人应用语词把握在语言之前并独立于语言的他早已知道的东西。语言使得诗人有能力将已经知道的东西呈现给思想,寻求“遥远的奇迹或梦想”的名称,诗人想将其与读者共享,共同经历。

随后的3个诗节叙述诗人的一种经验,诗人的经历打乱了原先的语言工具论观点,诗人拥有一个“宝藏”,要与他人分享,但却痛苦地发现,找不到名称来命名这个“宝藏”,“宝藏”随即消失,与他人分享“宝藏”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由此,诗人洞察到语词与事物、语词与诗人之间的关系。首先,他知道了,没有语词,事物不能保留。

在诗歌的末尾,格奥尔格痛苦地学会了弃绝,“学会了”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取得一种经验”。明白无误的是,他并没有弃绝在最后一行诗歌中所说的东西:最后一行有助于我们理解诗人学到了与语言的新关系。诗人弃绝的是他先前对语词与事物的关系的看法。但不限于此,他还弃绝了认为在他控制之下的语词。这里明显地存在着海德格尔的观点与格奥尔格学到的东西之间的平行。“我们并不拥有控制语言的能力”的说法在海德格尔的“语言说”中表达的淋漓尽致(Heidegger 1971a: 197)。人当然可以“说”,但仅能通过回应语言来说。

海德格尔将该诗的最后一行转换为陈述句,就是将“无物可存在”改为“无物存在”:语词破碎处,无物存在。

海德格尔对这一行诗进行了如下分析:某物破碎处,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一种损害。对某事物造成损害意味着:从某事物那里取走什么,让某事物缺失什么。破碎即是缺失。在词语缺失处,也即在每每命名着物的词语缺失处,无物存在。(Heidegger 1971b: 60-61)

仅仅实施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的,海德格尔进一步问:命名(nennen)是什么意思呢?

请注意,这里的“命名”不可与“唯名论”同日而语。

海德格尔自问自答“命名”指的是赋予某物以一个名称。

那么,名称又是什么?海德格尔指出,将名称理解为一个符号、记号、信号、标志或者暗示都是

不足取的。

这最后一行到底传达着什么意思?

一种可能是:语词赋予事物以存在。但这与常理相悖,听起来十分荒谬,通常总是事物先存在而后得到命名。比如,一位植物学家在研究过程中碰到一种尚未被发现与命名的新植物,之后,这位科学家才命名这个新物种,植物的存在先于科学家的命名。

于是,海德格尔提醒我们,要是这最后一行不是陈述而是命令,或是陈述与命令相互缠绕在一起,那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作为命令,这最后一行就意味着:在语词缺失之处,不要承认可作为存在的任何事物。这种意思与上面提到的植物学家的例子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然。设想当植物学家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处境,就是当他每每试图用语词来命名那种新植物并描述其特征时,语词缺失了。其他的植物学家听到这种情况,就会说:既无命名也无(植物的)特征(语词缺失之处),我们不能“承认有这种事物的存在”。

对诗人而言,语词可让物以存在出现并得以保持。语词托付给诗人,诗人知道语词是诗人实现召唤的源泉。格奥尔格经验语言走得更远。《语词》一诗揭示出诗人自己已进入语词与物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并不是一边是语词,另一边是物,而是语词就是“是”这种关系,语词留住物,所以它才是物。

该诗表明,诗人的召唤要求格奥尔格极力引导读者与听者阅读或者聆听诗歌,从而在语言中取得一种经验。既然“语词破碎处无物存在”,作为平日里就与语词打交道和描述存在各种方式的诗人,同样偏爱词与物之间关系的责任。在这种责任中,诗人同样也对存在方式的出现与不出现负有责任。通过履行与完成这些责任,诗人给读者与听者以馈赠。这种馈赠就是语言的馈赠。

诗是语言的馈赠,因为仅有语言才能清楚并准确地表达着对人的存在有意义的真理。

为什么“诗”对“思”如此重要?海德格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回答。

一方面,许多杰出的诗歌都是特定思想领域的反响,它们是这些领域的唯一召唤。也就是说,这些杰作就是它产生的那个时期和那个民族的思想最清楚与最强有力的呼声。

另一方面,思与诗近邻。“思”不是科学与日常的“算计”,也不是为生存而进行的“计谋”。同样,思也不是取得知识的手段,“思想在存在之野

中开沟犁地”(Heidegger 1971b: 70)。这又怎么理解呢?农民开沟犁地的目的在于将土地的表层翻入土中,下层土随之带到表面来见光见雨。

诗不仅仅诉诸审美情感从而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诗同思,它激励读者与听者去开启并将存在被遮蔽或埋没的部分带入人的理解中。由此,我们再次看到思与诗的近邻。一首杰作总能帮助思考在存在之野中“开沟犁地”。

无论我们怎样就其本质来探问语言,首先都需要语言本身把自身允诺给我们。

于是,构成语言特征与它的存在就是语言允诺人它自己的本质,正是通过这种允诺我们才与包容我们的存在诸方式相联系。我们一出生就被抛入一种特定的语言,接受其教育,并生活其中,一种语言已经允诺我们它的本质,也赋予我们命名并与存在诸方式和存在相关联。正是有了语言的允诺,海德格尔才可宣称: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是存在的看护者(Heidegger 1998: 239-252)。

那么,什么构成语言允诺给我们的那个本质存在?格奥尔格的最后一行诗指出回答问题的方向:语词破碎处,无物存在。

语言的本质存在就是没有语言无物存在。在语言中,人建构着与存在的关系,也建构着与存在各种方式的关系。要在思考语言本质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走,海德格尔建议我们思考:语言的存在——存在的语言。

3.3 寂静之音:语言之道说

但困难在于说清楚诗人的经验,因为诗歌中提到的“宝藏”还是无名。看来,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诗人到底拥有什么。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诗人的经历将始终是神秘的。难道诗歌对逃离诗人掌控的“宝藏”没给出什么暗示?海德格尔认为,有暗示。他指出,诗人的疆域从未得到的那个“宝藏”就表示语言存在的语词。诗人学会的弃绝来源于他进入不可说的领域。本源就是沉默,它拒绝诗人为“宝藏”寻求语词。然而,诗人并没有沉默,他在写,并在诗中告诉我们,他从发生的事情中学会某种东西。但他并不是学有关语言方面的东西,而是学会不同方式地说。这种与语言的不同经验被标示为“弃绝”。弃绝并非否定的东西,而是将宝石保持在思念中的方法。

但要保持某物又缺乏表示它的语词时,诗人是如何行事的?难道诗句的最后一行不是说得很清楚:无语词,无物存在吗?物不能被持存和保留。要是诗人的“宝藏”不是物,又当如何呢?如果不是物,上述断言就不能应用于这情况。如果

不能应用,为何诗人得出此断言呢?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宝藏”的确不是物,而是表示语词的语词(Heidegger 1971b: 86)。如果诗句的最后一行与这种解释一致,那么诗人寻求的就是表示语词的语词。于是,解读《词语》一诗的经历不再表示简单的缺乏语词,而是经历表示语词之语词的缺失。从“思”的角度来说,“表示语词之语词”就是“语言之存在的命名”。

“无”具有什么身份?经历“无”就是经历表达“存在”语词的缺失。这是海德格尔在解释格奥尔格时所带入的思想家的经历。他学会了,思想家如同诗人一样,语词缺失后,还能继续说与写。海德格尔进而对诗歌最后一行进行双重解读(Heidegger 1971b: 60-65, 151)。

根据第一层解读,诗人肯定:语词缺失之处,无物存在。这意味着语词独自将存在赋予物。

第二层解读关注这样的事实:诗人说自己以弃绝的方式在说。要弃绝的东西当然是先前诗人拥有的语言观。根据这种语言观,物处在先于语词的位置。但这种先在性在这里并未简单地被颠覆,而是诗人学会将自身顺从语言。诗人也不是学到很多有关语言的东西,而是领会了与语言的一种不同以往的关系。

如果诗人从沉默中学会了什么,那么沉默也应属于语言。这种沉默就是“寂静之音”(the ringing of stillness)(Heidegger 1971b: 108),海德格尔用此来指通往语言之路,即语词与物、语词与人之间的关系。

“寂静之音”指的是这种情况:当处在表示存在的语词缺失的沉默中,先前的语词(工具论意义上的语言)在远处回应。

海德格尔(Heidegger 1971b: 108)试图提供一种说法,以便表达思想家经历存在的语词的缺失。这与《词语》一诗的最后一行如出一辙:当语词缺失,一个“是”出现。

事实上,“语词缺失处,无物存在”与“当语词缺失,一个‘是’出现”这两种说法相互补充。陷入沉默的“是”是在场的“是”,是形而上学中被思考的“存在”。出现的“是”是存在之语言的“是”。面对无物,由焦虑引发的失语过程中,某种新东西出现了。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新东西产生于语言的转换:从语言的存在转换为存在的语言。

对此,海德格尔依据老子的“道”来创造一个词,用以表示语词之语词:道说(saying)(Heidegger 1971b: 92)。

以此来阐释“语言之存在 - 存在之语言”这个指导性的说法就是,语言属于存在,属于使所有东西动起来的那个东西。它属于存在,在存在中它说,这种说促使存在与存在诸方式显示。海德格尔明确表示,“道说”以既照亮也遮蔽地显示存在与存在诸方式。

4 讨论

从海德格尔与卡尔纳普论争的核心问题以及索绪尔将语言的本质归结为社会规范的观点来看,索绪尔与海德格尔都极力反对将语言研究划归自然科学范畴。

两者的方法都属于描述性质,索绪尔从系统的角度进行形式分析;而海德格尔以解释学 - 现象学为蓝本,进行意义阐释。这两者仿佛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如何使形式分析与意义阐释有机地给合在一起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4.1 对索绪尔的批评

奥格登和理查兹曾批评索绪尔头脑简单(Ogden & Richards 1989: 4),主要原因或许是索绪尔重形式轻意义,或许是他们还不太理解索绪尔在做什么。另外,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对索绪尔将语言从神坛上拉下来,使它置身于物质世界之中。索绪尔也表示否定语言的先验性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因为承认语言的先验性,也就意味着其随后的研究前提都只能是假设性质的。

实际上,在索绪尔两种方法中,仅有组合方法支持语言系统理论;而聚合方法除音位学之外,并不能给语言一种系统的学说。在音位学中,由于语言被看成声音体系,而不是语词体系,聚合方法的应用性成果颇丰,如雅各布逊等的结构主义音位学。然而,组合方法在索绪尔的思想中明显处于不重要的位置,因为组合方法涉及句法,在他看来,句法含有传统的理性主义成份,这与他的整体语言学理论不兼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是经验主义者而非理性主义者(Bar-Asher 2008: 23ff)。

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后期,其方法中的多数原则已经演变为语言学公理,不但机械呆板,而且其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Dickins 1998)。这种境况有违索绪尔的初衷(Jameson 1972: 13),他对传统语法中过多和僵硬的语法术语深恶痛绝。当代语言学,尤其是乔姆斯基的生成句法,同样原则繁多,不但没能跳出这个困境,而是越陷越深。海德格尔尖锐地指责僵化的语法术语和形式已完全囚禁了语言与语言学(Heidegger 1959:

52 - 53),这也可以视为间接地批判结构主义。

有的学者认为,索绪尔是以经济学为共时语言学模式。但是否索绪尔的观点来自经济学还是源自语言学内部?

研究索绪尔的专家科纳认为,索绪尔的共时语言观的形成源自他那个时期的语言学理论,而不是语言学外部(Koerner 1988: 67),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外部影响。科纳指出,外部的影响大多由于当时的“气候”,充其量就是表面的东西,比如杜尔克姆的社会学、瑞士洛桑学派的塔尔德(Gabrie Tarde 1843 - 1904)和瓦尔拉(Léon Walras 1834 - 1910)的政治经济等等,因为索绪尔对学科之外的认识仅是二手和表面的,这甚至包括索绪尔一再强调的“语言是社会事实”的断言也是相当肤浅。皮亚杰也认为,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仅仅部分地源自上述经济学家的影响(Piaget 1970: 77)。

4.2 对海德格尔的批评

海德格尔的理论不是简单地恢复语言原有的身份,而是试图建立语言的神圣地位;与这种语言观相匹配的方法是阐释学,因为海德格尔所谈的“诗”与“思”均在可计算思维的范围之外。

如何看待海德格尔的方法?

从现代科学方法的角度来看,海德格尔并没有提供一套可供模仿并直接应用于语言学研究就能取得预期成果的方法,因为思想与科学表象是两码事。

海德格尔自己说,如若我们把这演讲要讲的内容理解为一系列关于语言的陈述,那么它就还停留于未经证实的、不能科学地加以证明的各种论断的路上(Heidegger 1971b: 111)。与之相反,如若我们从那种与道路相涉的事情出发来经验通向语言之路,那么或许就可能唤起一种猜度:从此以后,语言便让我们感到诧异,我们与语言的关系就表明自身为这种关系。

将语言看成与存在具有同一性要求,从而扩大语言概念。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作为“道说”来理解,显然超越了索绪尔的“语言”概念,而是包括“建国、思想、诗和艺术”在内的所有东西。海德格尔称它们为“本真话语”。

在方法上,海德格尔也承认自己的阐释有吹毛求疵之嫌。更为突出的问题则是其阐释的任意性与独断性。在这方面,艺术史家夏皮诺曾一度指责海德格尔(Heidegger 1971a)对凡·高的名画《鞋》的误读(Schapiro) (Derrida 1987: 258ff, Schapiro 1994: 135 - 151, Dikovitskaya 2005: 4)。

但海德格尔并不认为自己的阐释是任意与独断的,而是发生在一种比科学的严格性更有约束力的思想游戏中(Heidegger 1971b: 30)。

海德格尔语言观及其方法的最直观来源就是现象学和阐释学。

“直面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原则是让事物自身显示。不管研究什么事物,现象学的方法规定,该事物应该以它自身显示的方式得到研究。那么,语言的自身显示就是:语言自身说。

海德格尔明确指出,解释学既不意指关于解释技艺的学说,也不意指解释本身,而是指一种尝试,即首先根据解释学因素来规定解释之本质(Heidegger 1971b: 28)。被用作“现象学”的形容词的“解释学”,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意指有关解释的方法论,而是指解释本身。

参考文献

- Bar-Asher, E. A. How an Empiricist Finds a New Science: An Epistemological Inquiry in Ferdinand de Saussure's Linguistic Theory [A]. In Michel Arrivé (ed.). *Du côté de chez Saussure* [C]. Limoges: Editions Lambert-Lucas, 2008.
- Derrida, J. *The Truth in Painting*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Dickins, J. *Extended Axiomatic Linguistics* [M].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 Dikovitskaya, M. *Visual Culture: The Study of the Visual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M]. Cambridge, Mass. /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5.
- Heidegger, M.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Heidegger, M. *Being and Time* [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 Heidegger, M. *Discourse on Thinking* [C].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6.
- Heidegger, M.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C].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1a.
- Heidegger, M. *On the Way to Language* [C].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b.
- Heidegger, M. *Pathmarks*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Jameson, F.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Koerner, K. *Saussurean Studies/ Études Saussuriennes* [C]. Genève: Editions Slatkine, 1988.
- Ogden, C. K. &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C]. San Diego/New York/London: A Harvest/HBJ Book, 1989.
- Piaget, J. *Structuralism* [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0.
- Saussure, d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 Saussure, de F. *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0 - 1911): d'après les cahiers d'Emile Constantin = 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1910 - 1911): from the Notebooks of Emile Constantin* [C]. Oxford /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3.
- Schapiro, M.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Art: Style, Artist, and Society* [M].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94.

收稿日期: 2012 - 10 - 30

【责任编辑 李洪儒】